“口述历史”抢救濒危的记忆

我的抗战

《我的抗战：300位亲历者口述历史》
《中国传奇2010之我的抗战》节目组 著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崔永元自筹巨资拍摄的大型电视纪录片《我的抗战》，于11月在全国85家电视台同步播出，其同名图书《我的抗战》也已出版。据悉，该纪录片是崔永元团队历时8年、耗资1.3亿元精心完成的一部口述抗战史记，共采访3500人，集成影像200万分钟，搜集老照片300万张。

同名图书《我的抗战》呈现了纪录片的原貌，展现了历史画面的原生态魅力，同时逾越了电视表现“不可为”的边界，还原了编导们深为憾惜的割舍了的精彩内容，在电视初编的大量资料基础上，做了颇有历史深度的延伸。全书由300位抗战老兵真情讲述，由24个独立的抗战故事组成。首次将战俘、伪军作为历史正面叙述的主角；重新为中国空军、文艺抗战者、情报工作者、修路民夫、知识分子等找到了合理的历史位置；描述了抗战过程中的爱情、友情、亲情；呈现了正面战场的22次重大战役，以及敌后战场的几次辉煌战斗，包括百团大战、松山之战、平型关战役等。

永远的微笑……爱情泣歌

爱情是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情感之一。在战火纷飞的年代，越是在生离死别中，人性的光芒就越是四射。在战火中，亲人更加亲密，朋友更加珍贵，爱情则更增加了生命的本色。

1940年前后，苏毅正在延安抗大的文工团当音乐队小组长。戏剧队里有一个外号叫小牛的大学生。

小牛思想自由，个性率真，与大家有些格格不入，组织上让苏毅多帮助他。单纯的姑娘一心要完成任务，她没留意小伙子爱慕的眼神。

行军休息的时候，小伙子经常会买些零食送给姑娘吃。虽然碍于周围人的目光，姑娘觉得很难堪，但她心里知道，小伙子总是惦记着她。

时间长了，青年男女的频繁接触引起了风言风语，姑娘在日记里写下了自己的检讨：“群众对我有这个意见，我今后得注意点。”

小伙子无意中看到姑娘的日记，虽然感觉有些无奈，有些愤愤，但是这并没有阻止小伙子对姑娘的痴情。

1941年，敌人对晋察冀边区实行秋季扫荡，文工团准备向冀中撤离，路上姑娘生了病，痴情的小伙子无微不至地照顾姑娘。那时，姑娘已经深切地感受到小伙子是诚心诚意地对她好。

后来，姑娘藏在老乡家养病，小伙子随队伍上了前线。在战场上，小伙子负伤了，他的膝盖骨被打伤，流了满地的血，最后被人扶着到了老乡家里。

老乡家缺医少药，小伙子没少受罪，不但腿肿了，还生了蛆。姑娘的病好转以后，就去看望小伙子。十来天没见，小伙子瘦了一大半，非常憔悴。但一看到姑娘，他立马来了精神。

部队集合的时候，姑娘嘱咐小伙子好好养伤，并约定等小伙子的伤养好了，再来接他。

谁都没想到，这竟然是他们的最后一次见面。因为伤口感染，小伙子牺牲于1941年。

许多年过去，最后一次见面时，他温和而又凄凉的微笑，越来越意味深长，那是姑娘心底的一个伤口，随时光慢慢淡去，可是并不会消失。

姑娘没有他的照片，但她不会忘记他的名字，他叫岳阳。

失去琼轩很多年了，可是在那些漫长的梦里，李基中老人总是被带回年少时光，那时他才十一二岁，他唯一的朋友是那个叫虞琼轩的小姑娘。小姑娘比他小，是父亲老友的女儿。

青梅竹马的爱恋，从那个时候起，已在少年心底萌发。

再见琼轩已经是几年之后，他们都是中学生了。过去熟悉的那个女孩子，现在变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了。李基中当时心里又惊又喜。

他禁不住想要跟她亲近，但一起坐公车的时候，他尽量不靠近琼轩，表示自己是个正直的人，没有什么歪门邪道的想法，想以此受到姑娘的尊敬。他当时甚至想，坐轮渡的时候，如果船翻了的话，他肯定能够把她救起来。

炽热的喜爱和英雄救美的豪情并没有让他有足够的勇气向姑娘表白。一方面，那时候家里已经给他订了亲；另一方面，他觉得自己长得不好，琼轩不可能喜欢自己。

后来，参军的消息传来，他终于鼓足勇气，不再躲闪，他要把自己几年来对她的思念一股脑儿地说出来。因为，这一别，可能是永别了。

不凑巧的是，当时琼轩中学毕业会考，不会客，所以他们最终也没能见上一面。

深夜，在死寂的战场上，青年写下每一次与姑娘相聚的心情，他把日记寄给了姐姐，而姐姐则故意把弟弟的信和日记放在桌上让琼轩看到。

不久他收到了姑娘的来信，一共是四首古诗，李基中老人到现在都能够清楚地背诵出来。其中的一首是这样的：天涯相隔两迢迢，欲寄愁心塞雁遥。忽见鸳鸯情得得，教侬心乱更魂销。

兜兜转转，原来日夜思念的人也正思念着自己，巨大的幸福感将青年击中。

浪漫的爱在战火中注定无法栖身，不久后，小伙子决定秘密投奔八路军。前路茫茫，生死未卜，他要忍痛斩断情丝。

为了抗日，为了找寻出路，为了救中国，他要抛弃一切，包括自己最心爱的姑娘。

他最后给姑娘写了一封信，然后把信、照片以及姑娘之前寄给他的全部信件，用挂号信寄给了姑娘。他说：“我像一匹没有缰的野马一样，我到底走到哪里现在说不清。”

后来他零星得到琼轩的下落，听说她嫁了人，过得并不幸福，最后投河自尽。

许多年了，在每一个长梦里，琼轩总是十一二岁的模样，天真烂漫没有悲伤，她身后是灿烂的花海，她微笑的样子一如当年。初恋大多没有圆满结局，那些记忆被禁锢在时间深处。每一次挖掘出来，无论是幸福还是疼痛，都鲜活如初。

选取以上两个抗日期间的爱情片段，只为了说明一点，不管在什么样的时代里，爱情的名字只有一个。爱情里有美好，有思念，有忠贞不渝，也有罪恶、伤害和欺骗。这其实跟时代无关，它关乎人性。在这个“非诚勿扰”的年代里，爱情的名字并没变过，只是少了些不顾一切的坚韧，少了些万水千山的牵挂，少了些生死未卜的期许，少了些生死与共的传奇，少了些荡气回肠的悲欢，因此变得更平淡、更实际、更急躁、更脆弱。然而，这可能是另一种悲剧。

战俘……抗日英雄的另一种存在

小的时候，我常和伙伴们玩一种战争游戏，一方扮演好人，另一方扮演坏人，然后在空地上激战一场。结局显而易见，好人总是战胜坏人，而坏人在这个时候必须表现得怕死、求饶。若干年里，在我的头脑中竟形成了这样的印象：只有坏人的俘虏和好人的英雄，好人即便被俘，也只有英勇的战死。

然而，今天才知道，在抗日战场上，还有一群另类的民族英雄，他们英勇抗战，在战到弹尽粮绝那一刻时，他们选择保留对生命的尊重，沦为战俘。从那时起，“耻辱”二字就成为他们心中一生难以消除的阴影。因为在战场上，军人的命运无非三种：凯旋、战死或被俘，能成为凯旋者固然是最高的荣誉，战死沙场也是战争赋予军人的特殊礼遇。而只有被俘，是几乎被钉死在耻辱柱上的，即便在受到种种折磨、痛苦艰难存活之后，亦难以摆脱怯懦妥协。

1944年8月，日本侵略者为了弥补国内劳力不足，强化国内的战争经济，从中国北平清华园战俘营中挑选出300名身强力壮者，运往日本做苦役，原国民党上尉连长耿谆被指定为这群战俘的大队长。

到达日本后，他们被押送到秋田县花冈町中山寮的一座工棚，为铜矿的下水道清淤。在日本人的监视下，中国战俘被强制每天做工，开始是每天十二个小时，后来慢慢增加到十三四个小时，到最后变成十六个小时。这里的监工大多是从中国战场负伤回国的日本士兵，仇恨使他们想方设法地虐待中国战俘。

从事重体力劳动，又要受到日本人的折磨，这已经让战俘们的日子生不如死。同时，他们还要面临饥饿和寒冷的威胁。战俘们每顿只能吃到两个橡子面馒头，不但吃不饱，而且吃下去肚胀难消化。日本人只给每名战俘发一身单衣，冬天时也仅增加一个杂色毛背心和一个蓑衣，冻得实在难以忍受时，他们就用水泥袋纸裹在身上御寒。

无边无际的苦难折磨着这些漂泊的灵魂，既然早晚会被折磨死，还不如轰轰烈烈地去死。耿谆和难友们不是孬种，他们决意一拼，只求速死。

1945年6月30日晚上，在耿谆的指挥下，二十名精选出来的突击队员，趁夜色冲进监工住房，棍棒齐下，当场就打死几名监工，剩余的监工趁乱逃跑，整个矿山顿时大乱。

满山遍野回响着尖厉刺耳的警报声，耿谆不得不临时改变计划，他命令难友以小队为单位，迅速集合，每人带一件工具当武器，队伍匆匆向中山寮后面的狮子森山撤退。日本当局连夜调动了秋田县、青森县等地两万一千余名军警和宪兵，对逃出去的六百多名中国劳工围追堵截。一周后，除一人失踪外，逃出去的战俘全部被俘获。

被抓获后，日本军警将他们用绳子捆绑起来，带到镇上的共乐广场，让他们半裸着身体跪在地上。整整三天，不给饭吃也不给水喝，还要忍受日本军警的殴打，被折磨致死的多达一百多人。

1945年9月11日，耿谆被日本秋田县地方法院判处死刑，罪名是“战时骚乱杀人”。在最终宣判时，耿谆的死刑被改判无期。1946年11月，耿谆回到阔别已久的祖国。

中国战俘们的这次反抗被称为“花冈暴动”，当时，在中国国内的日军集中营中，许多被俘的中国军人也在用各种形式反抗日本法西斯，这也彻底改变了我儿时那种只有“杀身成仁”才是英雄作为的印象。

樊建川先生曾写过一本名为《抗俘》的书，在收集了若干抗战被俘人员的照片、文物之后，他用“抗俘”一词形容这些战场上的幸存者。“抗俘身受三重痛苦：敌方的残暴杀戮和残酷折磨，我方的深重鄙视和入骨误解，己方的无休自责和无穷懊悔。三重苦难，一重沉于一重，如影相随，让抗俘生不如死，死沉深海”，这是樊建川对于战俘的解读。在樊先生的“不屈战俘馆”里，保留了耿谆的两幅手书，其中一幅题为“知耻永生”。在耿谆老人已经年过耄耋、历史已经过去将近七十年后，他仍然摆脱不了心中的“耻辱”。如樊建川先生所说，“己方的无休自责和无穷懊悔”如影相随，这是战俘最大的悲剧。

这是一张张不屈的面孔，他们的英勇却不为人知；这又是一张张沉重的面孔，而沉重也伴随了他们一生。他们都有过去，却已经隐入了历史和时间的黑洞。